

# 试论中华文化传统与 当代城市文化生态建设

潘 飞 李建革

**内容提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命典范”的文化类型。如果说中国传统生命文化的精神在于万物生生与共,则“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可以看作是万象共生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具体展开与呈现。“多元通和”观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它肯定文化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之间的多源性综合与多样性互动,最终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共生体”的生成。

在城市化这一当代中国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城市共生精神的具体呈现,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在多元通和、美美与共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与内外文化打通、互补、共进,是新时期文化自觉的表现,它有助于我们博采众长,更好地着眼于城市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也有助于我们和传统更加深刻地相互理解,和世界共同提高。

**关键词** 文化传统 多元通和 城市 文化生态

潘 飞,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100081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100081

李建革,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站长 100081

## 一、传统文化生态之“多元通和”性特点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源于以斯图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sup>[1]</sup>,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以及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法则与运行机理”<sup>[2]</sup>。当然,与美国文化生态学派主要关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

[1]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 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转引自: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见牟钟鉴:《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2]李翔海:《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理论特质及后现代意义》,[北京]《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动关系”<sup>[1]</sup>有所不同,此处所提到的“文化生态”,则从文化生命即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有机一体的生命系统的视角出发,更侧重于考察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这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文化是一种生命现象,“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有自身的内在秩序和规律”<sup>[2]</sup>。其次,千姿百态的文化汇聚一道,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以各种“文化群、文化圈、文化链的形式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sup>[3]</sup>。

历史地看,作为一种典型的“生命即本体即真实”<sup>[4]</sup>,即以“生命典范”<sup>[5]</sup>为基本范式的文化类型,中华文化的传统根源于“万物有生”而来的“万物生生”的生命信仰,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下》),“天地之所贵曰生”(扬雄《太玄·大玄文》)。这种生命信仰落实于现实世界之中,则展现为一种“万象共生”的文化精神,儒家谓之“仁爱”,道家谓之“道德”,佛家谓之“慈悲”。“万象共生”的文化精神如果更进一步具体到社会文化生活和实践的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模式与格局<sup>[6]</sup>。换言之,“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展开与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多元通和”的概念由学者牟钟鉴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基础上提出。所谓“多元通和”,首先体现在肯定文化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与文化的“多源性综合,多样性互渗”<sup>[7]</sup>。中国文化传统一向注重文化的多元差异性与多样互补性,认为“不同”乃是万物生发的根本。在西周末年著名的“和同之辩”中,史伯首次区分了“和”与“同”的概念,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简而言之,就是“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sup>[8]</sup>,协调并进,产生新的事物并不断发展;而“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sup>[9]</sup>,事物的生机也会因此遭到窒息。此后孔子集先人之大成,提出“和而不同”,这成为日后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底色。

由“和而不同”出发,文化中华进一步挖掘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通性精神”<sup>[10]</sup>,并最终成就了人类文化史上“多元通和”文化生态的典范之作。浸润于“多元通和”的模式之中,“中华文化从开始即表现为多元发生与不断汇合、沟通,在交渗中分化创新,既保持其发展的多样性,又保持其共生的和谐性,同时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连续性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姿态、宽厚的心胸”<sup>[11]</sup>,不断融汇外来文化,不仅允许它们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对话合作,而且注重彼此互通有无、互动互促,这些都使得中华文化体系成为一类个性鲜明、姿态万千而又稳健成长的“文化的共生体”。

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模式亦是“人类的珍贵文化资源”<sup>[12]</sup>。在多元通和的视野中,文化间的

[1][美]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l evolution),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版。

[2]战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所谓“生命典范”的基本范式,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见:李翔海:《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理论特质及后现代意义》,[北京]《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6]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7][11][12]牟钟鉴:《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参见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第278页,第278页。

[8]乐黛云:《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远近丛书〉序》,汤一介、乐黛云等:《远近丛书》(第一集),上海文化出版社、法国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2000年版。

[9]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10]曹兴:《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和解、共生与共进绝非乌托邦式的主观幻想,而是文化发展过程的“实在动能”<sup>[1]</sup>。因为各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sup>[2]</sup>。它们仿佛园中百草,看上去参差不齐,姿态各异,却相互映照,由此成就了一个生意盎然的“文化的百花苑”<sup>[3]</sup>;它们又好似哺育人之五谷杂粮、山珍海味,表面上有粗有细,实际上都是天精地华,各有妙用,共同造就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灵动生命。如果百花园中只有一枝独秀,那么花园很快就会荒败;如果人只食肥膏厚腴,那么不久也将因偏补而衰亡。

## 二、“多元通和”与城市文化生态

打造“城市精神”俨然已经成为时下城市化中国的一股文化热潮。哲学地看,城市精神指城市文化生命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以及足以指引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正如城市学家齐康先生所言,“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sup>[4]</sup>。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城市精神”这样一个富有生命意蕴的人格化概念的接受和讨论,反映出人们对城市本质和城市文化模式的反思与再认,亦体现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理想的追寻。

包容、厚德、创新等等语汇的提炼与提出,都带有一种城市共生精神的意蕴。而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共生精神的立足点,在于营造多元通和的城市文化生态,因为人类社会共生精神的本意,即在于“同异质文化的共存”<sup>[5]</sup>。也就是说,共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本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sup>[6]</sup>。

构建多元通和的城市文化生态模式,一方面要保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多样性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sup>[7]</sup>;一方面则要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沟通,彼此学习”<sup>[8]</sup>。因为只有互通有无才能促进城市文化的创造力。只有这样,城市不同文化才能“长期共存,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学习与合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文化生态”<sup>[9]</sup>,共同成为城市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 1. 同则不继:多元性与城市文化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sup>[10]</sup>。城市文化的多样性需求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需求。这种多样性,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

[1]曹兴:《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2][10]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9]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见牟钟鉴:《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第95页。

[4]齐康:《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北京]《城市管理》2003年第2期。

[5][日]天沼香:《日本人与国际化》,吉川弘文馆版1989年版。转引自[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卞崇道、刘荣、周秀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6][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卞崇道、刘荣、周秀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18页。转引自袁祖社《“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的“互利共赢”与“价值共享”——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人文理念与实践目标诉求》,《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7]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8]游斌:《多元通和、经典互读,促进宗教间对话——与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的访谈》,[北京]《中国民族报》2011,10(11)。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sup>[1]</sup>。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促性和补位性也就越强,整个文化生态的稳定性、繁荣性和资源可利用性就越好,它承受内外干扰和压力的能力相应地也就越大。反之,“除却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源源不绝的代价”<sup>[2]</sup>。

现代城市文化“趋同现象”<sup>[3]</sup>的危机已经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代价。在全球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全国城市化的热浪而至的,是单一的现代工业文化、经济至上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和精英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侵蚀。“许多城市都用‘现代化’这个单一体系取代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sup>[4]</sup>

采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文化城市化”<sup>[5]</sup>运动甚至使许多最偏远的民族地方文化也难逃被标准化的“现代都市文化”同化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曾经“跨越河流和山脉,构成民族界限”<sup>[6]</sup>,作为“民族文化样式”<sup>[7]</sup>标志的丰富多彩的民族地方语言,以惊人的速度在城市中,甚至在民族中心城市中衰退,许多地方族群的年轻后代甚至已经不会讲本族话<sup>[8]</sup>。于是,我们看到沿海平原的房子式样被简单地搬到雪域圣城拉萨,而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城市里则找不到代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sup>[9]</sup>……还有许多作为地方“精神空间和艺术语言”<sup>[10]</sup>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建筑被野蛮地拆毁或“文明”地切割迁移,同时再摆上几个半新不旧的仿古物,或采挖移植回几棵古树以资装点,强充“城市特色”。于是,我们看到大江南北,甚至最偏远的城市中,也都充斥着逐奢、拜金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浮躁风气,一座座本应服务于广大市民的“人居城市”,却被打造为满足少数“精英”们“品味生活”的“富人居城市”<sup>[11]</sup>。

可见,保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正当其时,且时不我待。为了重现我们城市鲜明的文化个性,不再重蹈“城市特色危机”<sup>[12]</sup>,我们不能再盲目地破坏历史积淀而成的城市文化原生态,从而“使地域文化特色面临灾难性破坏,甚至使一些文化品位极高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向毫无特色的城市行列滑去”<sup>[13]</sup>。为了守卫我们城市文化生命的健康、和谐与安全,保卫“作为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市民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和属于每个人的文化、信仰空间,真正实践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我们需要“放弃唯我独尊,

[1][2][美]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转引自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4][6][7][9][10][13]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5]“文化城市化”的倾向是前现代以国家、地域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角色、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在为我们所经验: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规模巨大、内容丰富的城市性文化市场;另一方面,迅猛发展的技术为我们搭建了城市性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提供了一整套用于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非本土内的齐一性惊人地显露出来。我们可能崇拜同一个文化偶像,向往同一个旅游城市,穿同一种品牌的服装,喝同一种软饮料。我们为同一个文化主题激动或者焦虑。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由于发达的电信、广播、交通设施,文化流动所覆盖的区域与达到的频率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人们对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的价值认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整齐划一。见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调查结果表明,壮族移居城市后,仅仅到了第二代,就已有50%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到了第三代,又会有剩下部分一半左右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如此看来,壮话在城市的衰退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见韦东超:《城市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以广西百色市壮族为例》,〔贵阳〕《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1]钟雅琴:《城市发展与文化生态多样性建构》,〔北京〕《中国文化报》2010.01(08)。

[12]侯正华:《城市特色危机与城市建筑风貌的自组织机制——一个基于市场化建设体制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2003年。



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sup>[1]</sup>的健康心态对他者的文化选择。为了保障我们城市文化生命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尊重城市文化演化的自然性和规律性,保护城市文化生态园的基因丰富性,因为“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而“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sup>[2]</sup>。

所以,保护城市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关键在于放弃“驱异为同”的文化幻想和文化强权,在于承认不同文化多线进化和多样共生的客观事实,在于理解不同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都有“保持自身的必要”<sup>[3]</sup>。

## 2. “会通、和会”<sup>[4]</sup>:通和性与城市文化的创造力

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模式所鼓励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孤立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文化孤立主义忽视历史上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积极互动关系,片面强调保存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顽固地认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具有一种‘不可通约性’。因此,为保护‘未被污染’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自我孤独。”<sup>[5]</sup>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曾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播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sup>[6]</sup>

城市文化生命要可持续,除去多元包容的基础,还需要创造、创新的动力,二者不可偏废。当前,创新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甚至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因为现代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巨系统,其“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不是某一种传统,或某一种现成的近代理论、方法、途径所能得以解决的,我们必须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遗产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在比较文化中认识和发展自己,博采所长,取其所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立足于创造”<sup>[7]</sup>。

历史证明,“中华文化创造力的强弱与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密切互动紧紧相连”<sup>[8]</sup>。因此,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创造、创新,其要也首先在于通贯古今,融会中西,通和万物,方能推陈出新,方能返本开新。否则,只有“多元”而无“通和”,则文化易陷入狭隘,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化创造”<sup>[9]</sup>。

城市文化之“会通和会”,需要推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学习,如此才能做到“上下通、内外通、人我通”<sup>[10]</sup>。就文化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有了“通和”的文化意识,我们就不会陷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窘境,而是会以感通与体贴的态度去探寻民族文化生命的来源与发生,去考

[1][3]游斌:《多元通和、经典互读,促进宗教间对话——与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的访谈》,〔北京〕《中国民族报》2011,10(11)。

[2]郑园园:《尊重文化多样性》,〔北京〕《人民日报》2005,10(23)。转引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4]“会通”一词出自“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易传·系辞上》),有“融会贯通”之意;“和会”一词则多见于佛教入华后的传译经典之中,有“和合、融会”之意。如北齐那连提耶舍(490-589)译《月灯三昧经》中“有声音以思想故,同思想以和会故”。总的来说,“会通”与“和会”之用法,大同而小异。

[5][8][9]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6]鲍宗豪:《文化国际大都市的价值追求》,〔上海〕《文汇报》2008,04(20)。

[7]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台北〕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6页。转引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0]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见牟钟鉴:《探索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察民族文化生命的演化与发展,也就是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做到“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sup>[1]</sup>。

越是深入地返本自知,我们就越能理解自身文化传统“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sup>[2]</sup>,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所反映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情趣,至今也还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文价值”<sup>[3]</sup>;也就越能理解传统文化之多样性、多地域性的丰富存在是对现代城市文化同质化、去地方化之通用主义单调性的积极矫正。

因此,“‘返本’与‘开新’不能分割,只有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文化发展的新局面”<sup>[4]</sup>;才能使城市文化的自主创新不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5]</sup>;才能使我们的城市文化获得“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sup>[6]</sup>。

就文化之本位与舶来的关系而言,有了“通和”的文化意识,我们就不会陷入“全盘西化”或“我族中心”的文化偏执,而是会以欣赏与冷静的态度去对话、学习全球城市化时代五彩纷呈的全球城市文化。因为在“美人以美”的文化审美中,我们理解到“每种文化构成了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只有以尽可能多的角度来观察它,才能达到了解它和与它相处的愿望”<sup>[7]</sup>。不仅如此,全球一体化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告诉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各种文化,因为“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智慧、价值观念丰富了人类社会,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融合、发扬不同的文化,为人类寻找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sup>[8]</sup>。

因此,在以我为主,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打通、融汇、互补,有助于我们博采众长,更好地着眼于城市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有助于我们和世界更加深刻地相互理解、共同提高。也只有这样,我们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sup>[9]</sup>的宏大创想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可以得到实践的远大理想。

[责任编辑:天 则]

---

[1][5]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见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第478页。

[2][3]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6]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见鲍宗豪、胡以申主编:《文化:国际大都市的灵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2页。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宣言〉——建筑学的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237页。转引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南昌]《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9]鲍宗豪:《“文化自觉”与国际大都市文化建设》,[深圳]《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